

秦火之后的齐鲁学者

□徐兴无

徐兴无
书 | 话 | 文 | 脉

导读

经典与传统就像种子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依靠人们的勇气与坚守，在土地和家族中埋藏、生长。



山东省邹平市韩店镇苏家村伏生祠遗址

《该余丛考》
[清]赵翼撰 曹光甫点校
凤凰出版社《廿二史劄记》
[清]赵翼撰 曹光甫点校
凤凰出版社

山东省邹平市韩店镇苏家村伏生祠遗址,2013年列为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曲阜孔庙中纪念孔壁藏书的鲁壁

立秋之后，我去山东邹平市参加第六届国际《尚书》学学术大会。其间，邹平市政府、国际《尚书》学会以及伏生后人，在韩店镇苏家村伏生祠遗址举行了公祭伏生的典礼。伏生的事迹见于《史记·儒林列传》，他是秦始皇的博士，冒着秦朝的挟书禁令，藏《尚书》于屋壁之中。汉定之后，流亡归来的伏生只在壁中找到二十九篇。汉文帝时求能治《尚书》的人，而伏生年已九十，于是太常派文学掌故晁错往济南受教。太史公作《孔子世家》说：“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祇回留之不能去云。”看来读书与观礼皆不能少，可惜这座清代的伏生祠只剩下基础与残垣，虽经修葺立像，也只能让我们想见古人如何“习礼”了。

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秦火”之劫，历来备受道德的谴责，但其历史文化背景更值得我们深思。从政治版图上，秦齐楚魏韩燕等“战国七雄”都是经过约两百年的竞争遴选出来的统一中国的种子选手，秦最为强劲。从文化版图上，秦国却是最弱的一国。严耕望先生(1916-1996,安徽桐城人)《战国学术地理与人才分布》指出：

先秦学术兴盛，大抵在大河中流(三门峡以下)之南北、河淮平原中北部，东北踰泰山至海滨一带，此即三晋中心地带与宋陈鲁齐地区也。儒兴于鲁，墨兴于宋，道兴于淮北陈蔡地区，阴阳、兵、医兴于东齐，名、法、纵横兴于三晋，文学赋家兴于荆楚，大抵各有其自然地理环境与历史文化传统之背景也。

所以，先秦的学术皆在华山以东，即古人所谓的“山东”地区。秦国的文化弱势，是因为平王东迁后，秦人接收的关中地区多被西戎占领，西周的封建礼乐文化受到扫荡。秦国之所以能称霸并统一中国，恰恰在于积极起用客卿，也就是六国的人才。楚国上蔡人李斯向秦王上《谏逐客书》，称赞秦缪公求士，“并国二十，遂霸西戎”；秦孝公用商鞅，“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秦惠王用张仪，使六国“西面事秦”；秦昭襄王用范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与之相应，秦国也就成了战国诸子思想学术的实验场。但是为了实现秦国的政治目标，这种实验只能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所以，能让秦国变法图强的三晋法家学说成为首选。相对于儒家的王道政治，法家的政治原则则被称为霸道，推崇法令和权威的力量。《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记载秦昭襄王生病，百姓自发地为他祈祷。他却罚这个地方的里长和长老出了两副甲冑。他认为百姓之所以服从，是因为有权势的制约。如果靠仁爱获得百姓的拥戴，一旦不爱护就不听话。所以做君主得要断绝爱民之道。

在先秦诸子中，只有儒家思想根源于礼乐文化传统，编纂、阐释与传授《诗》《书》等文化经典。儒家反对功利主义的价值观，重视义利之辩，强调政治必须建立在道德之上，推重文教。可惜秦国一直没有儒家的市场，荀子是第一个进入秦国的大儒，已晚在昭襄王的时候。《荀子》中的《疆国篇》记载范雎问荀子“入秦何见？”荀子盛赞秦国山川险要、物产丰富，民风质朴，吏治肃清，已达到“治之至也”，然而他话锋一转，说尽管如此，秦国仍有一“謬”(xì)，也就是忧惧。那是什么呢？荀子说，秦国之治远未达到王道的境界，因为“其殆无儒邪！”不用儒生，是“秦之短也”。

秦统一中国前夕，相国吕不韦综合诸子百家的思想，编成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杂家著作《吕氏春秋》。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又建立了七十博士制度，其中既有经术之士，也有方士等，从制度上看倒是兼收并蓄，所以齐鲁的儒家学者也被征为博士。据王国维先生(1877-1927,浙江海宁人)《汉魏博士考》统计，见于《史记》的儒家的博士有齐人淳于越(《秦始皇本纪》)、齐人伏生(《儒林列传》)、薛人叔孙通(《刘敬叔孙通列传》)、《汉书》中还有羊子(《艺文志·诸子略》)等人。但是秦始皇的主导思想依然是法家，所以淳于越闯了个大祸。秦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阳县，博士七十人前为寿，大家都称颂秦的统一，将诸侯国变成了郡县，无战争之患。淳于越却站出来唱反调，说商、周享国千余岁，在于分封子弟以为枝辅，“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说：不同的时代应该有不同的政治，今天下已定，“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应该焚书并禁止民间学术：

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在这个禁令中，只有法律和方技术数才是可以学习的知识。实用与功利的文化政策使得秦始皇无法确立统一郡县制帝国的文化传统和道德价值。秦朝的短命有很多原因，文化战略的失误是最为根本的。

汉承秦制，但又确立经学和儒术，修正了秦制的文化方向，所以汉宣帝对太子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按照秦法，伏生应当“黥(qíng)为城旦”，即在脸上刺字罚作筑城的苦役。不过，和伏生一样敢于犯禁藏书的人还有许多，其中当数孔子的后人最有勇气。他们藏的《尚书》比伏生的二十九篇还多十六篇，也就是后来流行于汉代民间的《古文尚书》。《汉书·艺文志》记载：

《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

唐代颜师古(581-645,琅琊临沂人)注解道：“《(孔子)家语》云孔贲字子襄，畏秦法峻极，藏《尚书》《孝经》《论语》于夫子旧堂壁中，而《汉纪·尹敏传》云孔鲋所藏。”唐代经学家陆德明(550-630,苏州吴县人)《经典释文·序录》又说：“《书》凡百篇，及秦禁学，孔子末孙惠壁藏之。鲁恭王坏孔子宅，于壁中得之，并《礼》《论语》《孝经》。”孔惠之名不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孔襄是孔子的八世孙，做过汉惠帝的博士，长沙太守。伏生藏的《尚书》和孔氏藏的《尚书》都缺一篇记载武王誓师伐商的《泰誓》，刘向(前77-前6,沛郡丰邑人，今属江苏徐州)《别录》记载“武帝末，民间有得《泰誓》于壁间者献之。使博士读说数月，皆以传以教人”。此外还有东汉王充的《论衡·正说篇》记载西汉宣帝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赵翼(1727-1814,常州阳湖人)《陔余丛考》总结说：“《尚书》古今皆出壁中……盖遭秦有挟书之禁。学者多藏书于屋壁，以避秦时而俟后世。”

齐鲁的儒生还有参加反秦义军的。《史记·儒林列传》载：“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

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於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孔甲就是孔襄的哥哥孔鲋，此事也见于《孔子世家》。太史公说这些儒生之所以加入到平民队伍中，是因为“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汉魏时期有一本记载孔子家族言行的《孔丛子》，旧题孔鲋所撰，其中记载陈徐向陈胜推荐了孔鲋。《史记》中有《张耳陈馀列传》，说他是魏国大梁的豪杰，“好儒术”。

顾炎武(1613-1682,苏州昆山人)有诗曰：“为秦百姓皆黔首，待汉儒林已白头。”(《顾亭林诗文集》卷四《答潘耒(1641)》)儒家从孔子就形成了守先待后，为往圣继绝学的传统。战乱结束之后，齐鲁学人就积极地传授经典，为汉武帝独尊儒术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儒林列传》中说伏生找到二十九篇《尚书》之后，“即以教授齐鲁之间。学者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儒无不涉《尚书》以教矣。”王鸣盛(1722-1797,江苏嘉定人，今属上海)《十七史商榷》认为，文帝没有下诏让伏生将《尚书》献给朝廷，而是派晁错来受教，是因为“汉人传经，其文字音读、章句训诂，必有明师面授，方能承学，无师不能自读也”。《汉书·楚元王传》中记载高祖的同父少弟、楚元王刘交与鲁穆生、白生、申公曾向荀子的学生、齐人浮丘伯学习《诗经》，后因秦禁《诗》《书》而辍学肄业。吕太后时，刘交听说老师在长安，于是让儿子刘郢客代替自己和申公一起到长安完成学业。《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刘邦征战之时经过曲阜，“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高祖于鲁南宫。”这些都是齐鲁学者在民间讲学的事例。



传唐代王维绘绢本设色《伏生授经图》，现藏日本大阪府市立美术馆

古代的学术传承还与家学、家风密切相关。伏生可能是孔子弟子宓子贱的后裔，伏与宓同音。《论语·公冶长》中，孔子称赞子贱为君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贱曾为单父宰。刘向是楚元王刘交的五世孙，他编撰的《说苑·政理篇》和《新序·杂事篇》都有宓子贱治理单父的故事。颜之推(531-597,琅琊临沂人)《颜氏家训·书证篇》中说：“今兖州永昌郡城，旧单父地也。东门有《子贱碑》，汉世所立，乃云济南伏生，即子贱之后。”据《后汉书·伏湛传》，伏生亦字子贱。《伏湛传》说：“自伏生已后，世传经学，清静无竞，东州号为‘伏不斗’云。”齐地的伏生家族和鲁地的孔子家族堪称两汉数一数二的学术世家。赵翼《廿二史劄记》“累世经学”条说，周、秦以来，世世代代以儒术闻名的家，以孔子之后为第一，“计自孔圣后，历战国、秦、汉及两汉，无代不以经义为业，见于前、后《汉书》，此儒学之最长也。”其次是伏氏家族：“此一家历两汉四百年，亦儒学之最长者也。”